

## 生育文化

## 地理环境与文化生成

——云南少数民族生育文化形成与变迁的地理学解释

车文辉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职博士生, 江苏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

## 1 引言

自然界是文化产生的土壤, 环境是文化创造的自然基础。《论语》中说: “知者乐水, 仁者乐山。知者动, 仁者静。知者乐, 仁者寿。”文化的形成离不开一定的空间, 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研究文化, 必须从孕育、滋养文化的地理环境入手, 探明文化产生的自然前提。

文化, 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多维概念。从文化地理学角度讲, “凡是超越本能, 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产品, 都属于文化。”更简单明了地说, 文化即自然的人化。文化包括两个层次——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是文化特性在物质产品上打下的深刻印记, 表现为人们创造的与生产和生产相关的物质产品, 如工具、建筑等, 或是在自然界原本存在的物质, 经过人们的想象、变形, 被赋予某种特定的内涵, 寄托了人们的理想、志趣的某种具体有形的物质; 精神文化包括制度文化和思维文化, 表现为政治、法律、信仰、世界观、风俗等, 是文化的思想基础。

生育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构造模式, 是人们在生育及相关活动中形成的物质形态、意识形态和相应的制度规范, 包括人们在婚姻、家庭、生育、节育等活动中形成或运用的有形物质产品及无形的精神产品——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等。

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民族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 造就了不同民族的生育文化模式,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经过不同地域文化的传承、冲突与嬗变,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育文化。本文以云南为例, 研究地理环境对少数民族生育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影响。

## 2 地理环境对少数民族生育文化形成的影响

综观云南少数民族生育文化, 它们无不表现出对生殖的顶礼膜拜和对子女数量强烈的追求。如在白族, 鱼被当作女性生命之门和“始祖母”的象征, 妇女的服装上处处可见鱼崇拜的痕迹: 少女戴鱼尾帽, 妇女上衣、袖口、衣襟上缀着象征鱼鳞的银白色泡子, 围腰、裤脚边、鞋上绣有鱼纹图案等; 鱼同样也是水族先民最崇奉的动物, 它被当作男孩的象征, 在迎新时, 男方要用罩鱼笼和金刚藤叶代替鱼作为信物送到女方家; 新娘过门时, 陪伴她的也必须要有两条小鱼。迎新、过门离不开鱼, 是期冀婚后生育儿子, 传承香火。这一文化的形成, 一方面与云南少数民族所处的经济形态有关, 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 许多民族“巢居山中, 刀耕火种”, 他们仅凭借简陋的生产工具向大自然索取生存所需, 生产能力的低下, 直接导致少数民族对劳动力——尤其是男性劳动力的渴求; 另一方面, 则来自于恶劣的自然环境的压迫。历史上, 云南地区少数民族为逃避周围大民族的剥削和歧视, 曾一次次被迫放弃艰辛开垦和建设的家园, 远离良好的生存环境, 走向大山, 躲入森林, 在荒山野林、人迹罕至之处, 寻觅他们得以栖息之地。如居住在云南昭通乌蒙山区的苗族, 他们的祖先胜共工、战黄帝、受禹征讨、遭周难、沦奴于楚、逃避武陵、投靠比诺(部落), 明朝时期进入云南东北部的乌蒙山区。乌蒙山区地势环境险恶, 十倍蜀道, “山势磅礴, 莽莽森森, 山形陡峭, 通天绝地, 峡谷深处, 河流湍急”, 只有在这“牛叩头, 马博颊”的险山恶水, 他们才能躲避涂炭和灭族之灾。居住在地势险恶的荒山绝岭, 再加上气候“阴雾细雨, 凌冻冰雪”、毒虫猛兽、天灾疾病等, 少数民族可谓生活在“生存的极限边缘”。面对这样的生活环境, 向大自然的抗争能力又相对低下, 在与大自然的关系中, 他们始终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 “人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无能为力状态之中”, 这种人与自然的“不能关系”, 造成他们心理上的长期压抑和深深的痛苦, 为了解脱这种恐惧和痛苦, 他们只有两种选择: 一是祈求超自然的力量, 拯救民族于危亡, 二

是靠人类自身的再生产——种的繁衍来加速人口的发展,以保证自我的生存和整个民族的壮大。于是,渴望添口增丁成为他们的共同目标。

### 3 云南少数民族人口生育文化变迁的地理机制

#### 3.1 自然地理背景

云南处于青藏高原和东部平原、丘陵之间的过渡地带,是东亚大陆与印度次大陆和中南半岛的自然结合部,西南季风与东南季风的交汇点。云南具有极其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虽位居低纬,但地势较高,全省地势北高南低,呈三级阶梯式下降:滇西北是青藏高原的南延部分,地势最高,平均海拔4000~5000米,以高山峡谷地貌为主,为第一阶梯;云南高原的主体,平均海拔2000米,为第二阶梯;云南南部、东南部及西南部的边缘地带,以中低山、宽谷盆地为主,属第三级阶梯,滇南元江等大河谷地地势最低,平均海拔500米左右,最低处海拔仅76.4米。在这三级台阶中,大小山脉布满其间,河谷平原和山间盆地——通称“坝子”,散布于群山之中,构成区域性的立体垂直地形。这两种立体垂直的地形结构组合在一起,使云南看上去如同一座由无数小塔叠置而成的巨型塔山。立体的地形、立体的气候与立体的物产之间形成了相互作用的生态圈,从南至北,由低到高,从海拔76.4米到6740米,约8个纬度范围、910公里长的地带内,出现了热带、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带7个气候带,土壤、植被也出现同样的变化规律,相当于从海南岛至黑龙江小兴安岭的自然地带都在云南出现,使云南成为中国自然地带变化的一个缩影。多样的地形、多样的气候、多样的物产,加上多样的地表分割,便是云南文化生成的自然地理背景。这种垂直变化、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格局不仅为类型多样、立体分布的气候、植被、土壤、物产格局奠定了基础,也深刻影响了人口的生产、生产方式,从而对文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云南思茅地区,受气候、植被、土壤垂直地带性作用,各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呈现垂直分布——傣族主要居住于坝区及河谷盆地,拉祜族、佤族主要居住于山区,彝族、哈尼族主要居住于山区和半山区,这种分布格局,在当地少数民族流传的洪水葫芦神话也有所反映:洪水泛滥,有兄妹俩得到仙人指点,躲到一个大葫芦里,在洪水中漂了3年,洪水过后,兄妹俩无人可娶可嫁,通过滚石磨结成夫妻,妹妹生下一个葫芦,从里面走出了拉祜人、卡多人、汉人、傣族。各民族分东西时,拉祜人得到一把铁铲,所以他们以掏山茅野菜为主,只能住在山头;傣族分得一把刀、一粒木棉子,所以他们一直在找坝子开田种棉纺布;卡多人则用锄头在半山腰种庄稼过日子;而汉人分得了书,从此便可以不事劳作。这则神话说明,任何民族的生息繁衍都有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生存空间,文化实质上反映了地理环境对人们的社会生活所打下的深刻烙印。

#### 3.2 人文地理特征

云南所处的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受地理环境的多样性等因素制约,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呈现出开放性与封闭性并存的特点。

##### 3.2.1 开放性

首先,云南处于中华民族文明发祥地的黄河、长江流域与印度文明大放异彩的南亚次大陆之间的过渡地带,作为亚洲的次高地,它从地势上阻隔了东亚大陆与印度次大陆的联系,进而从文明上分开了中国轴心与印度轴心;其次,从文化圈域来看,云南是中原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南半岛文化交汇的三岔路口和冲积地带,不可避免地成为多种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多元文化地区。

云南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与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南亚国家为近邻,是连接亚洲大陆腹地与东南亚、南亚次大陆的链环,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的门户。云南的六大江河体系,将云南各民族与中原、南亚、东南亚联系起来,构成若干条民族迁徙、流动的走廊和文化传播的通道,因而云南既是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远古人类发祥地,又成为世所罕见的多种民族和多元文化汇聚地。云南与东南亚“江河同源,山脉同缘”,属于同一个地理单元:云南是红河、湄公河等东南亚著名江河的上游地带,中南半岛东部和中部的广大山地,均系云南横断山脉向南延伸的亲缘山地,最长的一条一直伸展成为马来半岛的骨干,它与东南亚地理上的亲缘关系导致了双方民族、文化上的亲缘关系。从民族源流来看,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东南亚地区的主要民族都可以在云南众多的少数民族中找到相同或相近的族源,直至现在,在云南与缅、老、越三国4060公里的共同边界上,仍有壮、傣、布依、苗、瑶、彝、哈尼、景颇、傈僳、拉祜、怒、阿昌、独龙、佤、布朗、德昂等16个民族与境外

同一民族比邻而居。

### 3.2.2 封闭性

云南深居内陆,远离海洋,山高谷深,江河众多,地形崎岖破碎,山地、丘陵、峡谷、河谷、平原和山间盆地相互交错,关山险岭,其95%的国土为山地高原,仅有5%为平地,而且平地都是狭小、孤立、星罗棋布地分散在群山之中的“坝子”,据统计,全省1平方公里以上的坝子就有1440多个,平均每个坝子仅有17平方公里。云南独特的地势地貌与生态环境,造就了云南人文环境的另一特点——封闭性。由于地形起伏巨大以及地表切割严重,云南被山川、河谷分割成一个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的、立体的小型自然生态区。所以,云南多样的文化地理特征是在相对孤立的状态下呈现的,所谓的“多样”是缺乏交流的、相对封闭的多样性。由于山峦叠嶂,地形复杂,坝子周围高低不等的山脉成为阻隔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天然屏障,人们的生产生活大多以坝子为中心,各个坝子之间的相互交往受到极大的限制,各民族之间人口迁移发生频率较低,各坝子居民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各民族之间及民族内部的文化联系和沟通因地域而受到限制,从而难以发生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和民族文化的冲突与嬗变,使较大规模和较大范围内的文化聚集与定向积淀十分不易,形成一种内向的封闭性,在这样“隔山喊得应,望山走死马”的区域里滋生并成长的云南少数民族生育文化,自然而然地就表现为“百里不同俗”,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各具特点的民族文化事象。

### 3.3 人口分布与迁移对文化传播与扩散的影响

#### 3.3.1 人口分布的影响

云南少数民族的分布虽然也有相对集中性,如滇西北主要居住着藏族、纳西族,滇西主要居住着白族、彝族,滇南主要居住着傣族、哈尼族、壮族,但总体分布格局不象北方少数民族那样呈单一民族、大范围水平分布,而是与坝子分布的零碎分散相一致,多民族交叉立体分布,交错杂居,人口分布大体上是以坝子为核心、以坝子边缘山地为外围,形成一个个相对孤立的社会文化地理单元,基本上没有形成大范围的民族聚居,只有小范围的相对集中,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这种格局,一方面使得各民族内部的文化传承难以继,另一方面则使他们必然加强和周边民族的联系,与其他民族频繁交流,进行文化互动,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发生变迁,最终形成一个个和相邻民族有密切联系的文化景观。如苗族普遍盛行祖先崇拜——蚩尤,以消灾、降福、求子和聚财,但后来在与汉族长期交流中,蚩尤崇拜逐渐淡化,祖先崇拜演变为在火塘柴尾处供奉家神,在堂屋的神龛上供奉具有深刻中原文化烙印的祖宗牌位。

#### 3.3.2 人口迁移的影响

任何文化的发生、发展,都无不随着人的活动而展开,少数民族生育文化的传播也是以其地理环境为初始条件进行,人口迁移等因素,对文化的各个层面——工具器物、生活方式、制度规范等施加影响。

自远古开始,云南的民族迁徙流动几乎从未停止过。云南外来民族就其族属渊源来说,基本上来自于北部的氏羌、东部地区的百越、苗瑶和南方的百濮四个血脉各异的族源。氏羌族群自甘青高原沿澜沧江、怒江和金沙江河谷南下,百越族群自东南沿海顺珠江水系西进,百濮族群自东南亚溯澜沧江北上,苗瑶族群从东北部进入,使云南在拥有众多土著民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大量的外来民族。从族源及语系角度看,云南有4大族群文化,即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白、怒、哈尼、纳西、傣、拉祜、基诺、景颇、阿昌、独龙等民族源于氏羌族源;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侗、水、仂佬、毛南、布依、傣等民族源于百越族源;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瑶等民族源于苗瑶族源;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布朗、德昂等民族源于百濮族源。

自战国楚顷襄王时庄 进入云南,开中原汉民族进入云南之先河。在2000多年漫长的岁月中,内地汉族通过军屯、民屯、商屯、征战、经商、宦游、逃难和被流放等多种途径,绵延不断地进入云南,带来了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汉文化传统。秦朝时曾迁徙50万罪徒到岭南与百越人杂居;元朝是移民、屯垦最为显著的时期,在云南多处建立了民屯;明代大批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首先在云南形成星罗棋布的屯田据点,沿交通线又将这些分散的据点串连起来;清康、雍、乾、嘉时期改土归流后,汉族移民从屯田据点和交通沿线向东南部、南部、西南部边疆的推移和扩展,汉族人口分布逐渐遍及全省,最终完成了汉族移民在云南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扩展过程与分布格局,把云南从一个民族众多但却没

有一个主体民族的地区变成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随着汉族人口在云南分布的全面扩展,中原文化开始在云南居主导地位,使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化打上了深刻的中原文化烙印。作为这一历史时期主流文化,在“以夏变夷”的文化同化政策下,中原文化全面改造、整合了各民族文化,纳西族、白族等发生了巨大的社会文化结构的震荡,走向了精英文化仿汉化,在中原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伦理道德礼仪,被云南各少数民族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生活中。如始于周代、从议婚到定婚过程的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至今仍在白族、纳西族、哈尼族、彝族中流行,男孩女孩成年礼——“冠礼”和“笄礼”,在内地汉族地区已消失,而在云南永宁纳西族却依然留存:少男少女13岁以前均穿长衫,到13岁举行“穿裤”(男)、“穿裙”(女)成年礼,成年后,他们可以去结交异性。白族奉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由父母包办,男女青年即使是自由恋爱,最终仍须经过传统的汉族婚俗程序方可成婚。白族男女成立家庭后,通常不得退婚或离婚,媳妇过了门,生为男家的人,死为男家的鬼,丈夫去世也得守寡扶持子女,开门立户沿袭香火。过去在白族聚居区随处可见贞节牌坊,随时可听到节妇、烈女的故事。据清《鹤庆州志》载,元明清以来,仅鹤庆就有“节妇”522人,“烈女”40人,“孝女”14人,“贞女”24人。

各民族负载着不同的文化先后进入云南,自然便使云南民族文化呈现出多元性。伏羲、女娲兄妹婚型神话,不是汉族所独有,苗族、瑶族、水族都有名字相同、情节相似的此类神话,都以血缘兄妹婚姻为背景,并且汉族以外的各民族此类神话都含有洪水神话的痕迹。苗族古歌“瓠王”就叙述了兄妹成婚的情形:天降大雨,只有伏羲、女娲兄妹留在世上,伏羲要和女娲成婚,继传人种,女娲不允,认为兄妹不当婚配,但禁不住伏羲再三求婚,兄妹结为夫妻,生儿育女;瑶族、水族的神话也大同小异,只是增加了二人乃受太白仙人或天神之命,又以石磨、隔山梳头为卜,不得已婚配这一情节。葫芦生人神话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它最早出自印度,后经蜀身毒道,传入我国,在我国各少数民族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由于各民族所处生态环境不同,对葫芦的功能利用不同,葫芦神话的流传与保存也不一致,有的民族将葫芦生人神话与洪水神话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富有特色的再生神话,有的民族则仍保留了独立的葫芦生人神话。

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在不断的迁移流动中,云南各民族逐渐形成了同源异流、异流同源而又源流交错的文化特征:以藏缅语族为主的西部各民族,由于接近古代印度文明的源地,多受印度文化的影响;以苗瑶语族为主的东北各民族,则多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并且它的许多神话传说也影响了中原文化,如女娲补天、女娲造人、父子连名制、对祖先瓠的图腾崇拜;东南部的壮侗语族各族,在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的同时,保留了独特的文化,诸如“不落夫家”等母系氏族遗风。因此,云南少数民族生育文化既有自我发展的成分,同时也是多种文化融汇的结果。

### 3.4 文化传播与扩散机制

#### 3.4.1 文化传播与扩散方式

不同类型的文化的传播和扩散是文化发展的重要过程,各种文化在云南少数民族的交汇、传播与扩散,形成了独特的人文景观。文化传播和扩散是随人口和物品的流动及思想的交流而进行的,主要有两种方式:扩展传播和迁移传播。扩展传播是某种文化不断向周围辐射扩大其影响范围的过程,指某种文化在空间上通过相邻地区的公众的接触,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随着接受这种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其空间分布也就越来越广;迁移传播是指具有某种思想、技术的个人或集团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地区,从而把这种思想或技术带到新的地区的传播方式。文化的迁移传播往往是跳跃式的,历史时期文化的迁移扩散大多是通过由于战争、经济开发或其他政治活动引起的大量移民来完成的,如果说扩展传播是潜移默化、和风细雨式的文化演变方式,那么迁移传播相对而言则是迅速的、急风骤雨般的。

在均质空间,如中原地区,一马平川,鲜有大的地形、地势变化,文化的空间扩散范围和强度呈距离衰减和时间衰减规律,即离文化源地越近或越接近文化起源的时间,那么这种文化被接受的程度越高,民族间的文化传播和借用也就越频繁,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似处也就越多。随着时间的延长和距离的增加,文化的空间传播范围和强度不断减小,影响越来越弱,成强弩之末;但在非均质空间,如山区,文化的传播和扩散除了受距离和时间的影 响外,还要受其他自然或人文屏障——如地形、气候、水文、语言等的影响,从而使多种文化在发生混合和融合的同时,也能保持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

我国西南边境山河相间、形势险峻,自西向东依次排列着南北向和西北—东南向的巨大山脉,与此同时,发源于青藏高原和横断山区的大江大河,又顺沿上述巨大山脉之间的山间谷地奔腾而下,分别注入印度洋和太平洋。借助山脉、河流走向,中原文化与东南亚文化之间的交流有较大的便利,这一条条从云南高原奔腾而下的河流,携带着古代民族的文化因子进入东南亚,孕育了中南半岛国家灿烂的文化;而对于印度文化和中原文化而言,山河却构成了文化传播天然的屏障,使得中原文化与南亚次大陆以及西亚之间的交流非常困难。虽然早在西汉时期就已形成了一条连接南亚的古老的国际通道——“蜀身毒道”,它起自我国的四川,经过云南、缅甸,直抵印度(汉时称身毒),是古代西南地区中原文化与印度文化进行交流的唯一通道,但由于地形险恶,两千多年来一直没有中断过,也没有兴盛过。因此,尽管云南地处印度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汇处,但它的文化底蕴却来自中原,澎湃汹涌的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文化在这里变成了涓涓细流,在云南少数民族生育文化中,只是间或有传说、神话流传下来;而云南与中原地区及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却尽享地利之便,深厚的中原文化、原汁原味的土著文化以及中南半岛文化得以在这里水乳交融。

### 3.4.2 文化传播与扩散的人文特点

任何文化传播到新的环境,为其他民族所借用和包容,不仅取决于文化传播的空间、距离、地形等限制,而且还取决于接受、借用文化的民族文化发展的水平、传统、理念和价值标准,取决于当地文化的特点。因为文化传播的接受一方,并非是一块“白板”,而是具有一定的固有的模式,它们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往往以已有的模式对外来文化加以衡量,从本身文化定势出发,对外来文化的解读、诠释。尽管侗族、壮族与汉族长期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但他们的生育文化却有非常鲜明的个性:迄今为止,依然保持了“不落夫家”的家庭婚姻形式。壮族的青年女子举行婚礼后,并不马上到夫家去居住,而是长居娘家,经过短则一两年,长则七、八年,甚至更久的时间,直到怀孕临产,才回到夫家长住。“不落夫家”实际上是母系社会主要婚姻形式——对偶婚的演化,它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中,双方进行反复较量与斗争在婚姻家庭形态的反映。由于壮族等民族的母系社会解体较晚,妇女担负耕织和家政的重任,“男多逸而女服劳,春秋田作及赶圩贸易皆妇女为主”,她们在社会经济仍有一定的地位,迫使男子不得不在婚姻上采取折衷、妥协办法,即女子婚后暂居母家,待有了身孕才迁到夫家定居。从“不落夫家”到“以育确婚”,反映了父系社会对家庭的嗣传和财产继承的维系和追求。

总之,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绝不是语言、宗教、传统道德、生活方式、思维特征等的简单拼合,而是在一定地理因素的影响甚至制约下,由各要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一个独具特色的综合体。作为区域内地理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的形成、分布及其物质、文化生活,诸如民族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居住形式及生产活动等,无不与这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研究少数民族生育文化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 参考文献:

- 1 冯天喻等. 中华文化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 2 王星等. 人类文化的空间组合. 上海民族出版社, 1990
- 3 夏曰云. 文化地理学. 北京出版社, 1991
- 4 费孝通等.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 5 赵济. 中国自然地理(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
- 6 杨一光. 云南省综合自然区划.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
- 7 江金波, 司徒尚纪. 论我国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前沿走向. 人文地理, 2002; 5
- 8 朱弘, 司徒尚纪. 开疆文化在海南的地域扩散与整合. 地理学报, 2001; 1

(责任编辑: 沈 铭 收稿时间: 2003-10)